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二五）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九三期 ——
（二〇一三年五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5a）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一）	孙怒涛
【读史笔记】	文革春秋	周家琮
【千秋功罪】	还原历史的真实图景	秦 晖 • 傅高义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一）

• 孙怒涛 •

〔编者按：作者孙怒涛，本名孙银基，1960年至1980年在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现计算机系）上学、任教。在清华文革初期任“井冈山兵团414总部”第二把手。他的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于2013年2月在香港出版。感谢作者惠赐该书电子文本，本刊自本期起选载其重要章节。〕

第三章 文革爆发蒋南翔倒台工作组反蒯（1966.6—1966.8）

第一节 保蒋还是反蒋？都有道理很难抉择

就在离我毕业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6月1日，从这天开始，中国进入了十年文革动乱，我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当时的中国，经过共产党十七年的经营，是一个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一个领袖（毛泽东）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这些青年学子，经过党的多年培养和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为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时刻准备着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有这么一群青年学生做先锋，只要领袖划一根小小的火柴，革命的烈火就会立即被点燃，迅即在中华大地成燎原之势。

现在，通过《人民日报》的社论，我们听到了这是党的号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召唤！我心中的一腔热血在沸腾！

就在几天前，风闻北大有人贴大字报了。清华北大是近邻，人员往来很便捷。哪个学校有点重大的事件发生，另一个学校基本就在第一时间知晓了。我到北大去看过热闹。不过没看到什么大字报。听说都移到室内去了，不对外开放。

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是对着北大党委的。《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明确地把北京大学定性为“三家村”黑帮 1 3 的重要据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

这些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爆炸在北大的上空，也震撼了消息纷传的清华。未名湖闹翻了天，清华园也如炸开了锅。

每一个清华师生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那么清华呢？陆平这个北大的校长被罢官了，那么清华的校长蒋南翔呢？清华究竟是“延安” 1 4 还是“西安”？蒋南翔是姓“马”（马列主义）还是姓“修”（修正主义）？

一个从来就没有思考过的尖锐问题，突然摆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必须马上作出抉择。

学校里陆续出现了一些怀疑蒋南翔姓“修”、怀疑清华党委是“西安”的大字报。

清华是蒋南翔 1 9 5 3 年担任校长后苦心经营了 1 4 年的根据地，号称是“一架不漏气的发动机”。党委依靠其强大有效的政工系统，组织力量对一切怀疑蒋校长姓“修”怀疑清华党委是“西安”的论调，坚决地予以迎头痛击。辅导员们、各级干部们、党团员们、还有数量众多的积极靠拢组织想入党的积极分子们，立即被动员起来，马上贴出了一批保卫校党委保卫蒋校长的大字报。声势浩大，顷刻就把那批怀疑的大字报给压了下去。

那几天，没有人来找我。可能是党团干部们太忙了，忙得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可能是他们认为像我这样思想认识本来就非常模糊的人，在紧要关头怎么能作为积极分子来依靠来使用呢？他们压根儿就没指望过我。或者，他们瞄着的眼睛也并没有完全忘记我？

虽然没人找我，我自己一点也没闲着。我成天在看别人写的大字报。

大字报上的两种观点截然对立，我看了觉得似乎都有理有据，都很有说服力。

那些保蒋的大字报，列举了清华在党委在蒋校长的领导下所取得的种种伟大成绩，以说明

清华党委是红色的“延安”，蒋校长是坚定姓“马”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我亲身经历切身感受到的。

我一直受到党的恩惠、组织的培养、老师的教导。学《毛选》、“学雷锋”、学焦裕禄等等活动，都使我觉得我是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成长的。尽管在“九评”学习的时候，心里有些委屈，那也是因为自己的思想认识有问题，立场上不够坚定，多亏了组织的及时帮助、挽救，才不至于犯更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党委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我这个工农子弟的政治迫害。我从我这个例子中正说明清华的政治思想工作卓有成效的。

那些怀疑的大字报也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清华党委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正在培养着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这些事例我相信也是真实的。但我总觉得那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支流而不是主流，是前进道路上正在克服着的问题。多年来受到的政治思想教育，以及用辩证的方法分析问题在此时不知不觉中发挥着作用。

所以，我的基本倾向是相信校党委，是保蒋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无法回避又难以想通的。清华与北大，同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同在北京，同受高教部蒋南翔部长的直接领导，执行的是同一条教育路线，在我看来，清华与北大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北大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堡垒，清华怎么可能不会像北大那样烂掉而独善其身呢？从这样的理性推导得出结论，我觉得清华党委和蒋南翔都应该有严重的问题，都难保的。

学校里，怀疑校党委与坚信校党委，反蒋与保蒋，开始了拉锯战。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没几天，怀疑的反对的大字报又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过不了二天，听说钱伟长这些老右派们看到反蒋的大字报，笑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一句大家熟知的毛主席语录。既然反蒋是让敌人高兴的事情，那肯定是错了。那些保蒋的人借此大做文章，把当前学校的形势与五七年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反右展览对大家的教育实在太深刻了。于是，保蒋大字报的气焰高涨起来，反蒋大字报收敛了不少。

还有的大字报认为党委是正确的，但是蒋南翔可能变修了。我想，蒋南翔作为清华党委书记，他要是变修了，这个党委的班子肯定也烂了，即使有好的也是极个别的。要是蒋南翔是姓“马”的，那么党委应该是“延安”，这个班子里即便有坏的，同样也是个别的。所以，清华党委究竟是“延安”还是“西安”与蒋南翔是姓“马”还是姓“修”，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同一回事。

那几天的形势变化实在太快，简直是一天一个样。

我忙着看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没写什么大字报。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应该表什么样的态。感性上的保蒋与理性上的怀疑蒋一直在纠结着。

尽管我一直摇摆着，但是慢慢地，我觉得校党委、蒋南翔都是应该保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要是清华党委都信不过，那相信党就是空谈的了。五七年的右派不正是用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手法来反对党的领导吗？

大概是到6月8日，我终于倾向保蒋了，我准备要写表态的大字报与那些誓死保卫校党委的主流派站在一起了。

正当全校师生在有关清华党委和蒋南翔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辩论得热火朝天不可开交还没有形成基本统一认识的时候，6月9日，从高教部传来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蒋南翔被停职检查了，他被罢官了！

这一下子，保蒋派全蔫了，反蒋派都笑了，摇摆不定的中间群众呆了，而像我这样刚刚拿定主意就要选择保蒋立场的人懵了。这形势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也太突然了！我在最后的时刻，尽管还没来得及行动，但在思想上已经站错队了！

蒋南翔真的倒台了，清华党委真的“修”掉了。有些上个月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的“准研究生”们把准考证烧掉了，以示与蒋南翔的旧清华划清界限。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毫不迟疑地把那张原来珍藏起来作为纪念的准考证拿出来当众烧掉了。原以为报考研究生是组织的培养，在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时忽然感觉是上了蒋南翔的当，是在迈向修正主义的白专道路。我以绝大多数同学无法模仿的举动表明我坚决拥护上级决定蒋南翔停职检查的政治立场和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的决心。

在大字报区我看到有这样的大幅标语：热烈欢呼“蒋”家王朝覆没了！当然，这是指盘踞清华的蒋南翔王朝覆没了。

蒋南翔是被清华师生揪出来的吗？当时有人提出这个疑问也有争论但是没有答案。到后来才知道，蒋南翔显然不是被群众揪出来的。那时候学校里保蒋的势力还大得很，绝大多数师生都不相信反右时候的坚定左派、高教战线上的掌门人怎么可能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蒋南翔是被上面什么人抛出来的。什么时候把他抛出来，取决于时机。早在《五一六通知》中，就写明了“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大概这个时候蒋南翔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倒台是迟早的事。当熊熊的革命烈火往上烧烤的时候，舍车保帅成了一些人惯用的伎俩。

第二节 贴了同班同学的大字报，羞愧难当

那些天，全校师生思想混乱、人心浮动、小道消息满天飞，清华园，如同经历了一次十二级地震。很快，北京新市委给清华派来了工作组，替代校党委领导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一个基层单位出了严重问题，按照惯例，上级总是要派工作组去处理的。我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来不久，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接受起来十分自然。

既然上面宣布了蒋南翔停职检查，工作组进校代行领导权，清华原有的党政机关团委学生会等等像是失去了主心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于是，批判蒋南翔、批判校党委、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呼啦啦地占据了压倒优势。保蒋南翔保校党委的大字报，几乎绝迹。在形势完全明朗化的当下，前几天还在使劲保校党委保蒋的，现在不敢再吭一声。那些反蒋的，还有大批中间群众，这个时候争先恐后地写大字报，以表示对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紧跟。

我与班里的几个同学在一起议论应该写点什么样的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议论过后，他们叫我执笔起草。在他们的印象中，好像我是很能写点文章似的。我不知道怎么

会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可能是在“九评”学习做检查的时候用心写的那篇发言稿，写的有点条理？其他场合，我好像并没有表现出有这方面的长处。

本没有什么文才，听到几句怂恿我的好话，我那好表现自己的冲动和欲望被激发出来了。既然叫我执笔，我就不再推辞，欣然受命。于是一篇洋洋数张的大字报很快就被我炮制出来了。

现在已经记不清这篇大字报写了点什么内容了。但是其中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阶级路线方面的表现，我在大字报上举了一个这样一个例子：说我班上有一位出身高级职员的海漂亮小姐来清华上学的时候，穿着布拉吉，拉着手风琴，抱着洋娃娃，一派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这里指的是我班一位姓冉的女同学。虽然没点名，但是我班上海来的女同学就她一人，班里的甚至同一年级里的同学都知道这是在说她。这素材是别的同学提供的。入学的时候我与这位女同学并不在同一班，根本不知道她的这些事情。我把这事描写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就像是亲眼看到似的。

这篇贴在12号楼附近的大字报，我们系里的同学可能都看到了。我现在想来，这篇大字报当时对这位当辅导员的女同学肯定造成了很重的思想压力和很大的精神伤害。

为这件事，我心里一直感觉愧疚。在毕业以后的几次同学聚会上，只要我一看到她，就会想起这件让我脸红的事情。

当然，如果要为自己辩解，“理由”很多，俯拾即是。最冠冕堂皇的一条就是，我本意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没做好，伤害了同学。

工作组陆陆续续进校以后，学校里发生了一些学生揪斗各级干部的现象。

职位比较高的干部肯定属于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上的黑帮，是首先被冲击的对象。

还有不少做学生工作的党团干部，有的与学生的关系比较紧张，也往往被当做黑帮爪牙冲击批斗。

我亲眼看到一位电机系的女老师，可能也是个辅导员吧，被剃了阴阳头，脸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她戴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脸肿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睁不开。

12号楼东边是一条通往主楼的大马路。在与11号楼之间有一个七八平米大小废弃的水泥板平台，这时成了天然的“斗鬼台”，不时有干部被当做“牛鬼蛇神”拉到这里进行批斗。

戴着纸篓做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小木板，上面写着打了叉叉的名字，脸上涂满了黑墨水，有的剃了阴阳头，被一群人押着，呼喊着重革命口号游“街”示众。这是当时清华园内常见的现象。热衷于这样革命行动的，以低年级的学生为多。

我心里有点怀疑，难道这真的是革命行动吗？

我知道这都是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斗争土豪劣绅的办法照搬过来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也不敢怀疑用在这里是不是合适、有没有错。但我总觉得这么照搬几十年前的做法，把干部都当作土豪劣绅来揪斗，似乎有点不适当。但是，疑虑归疑虑，哪敢说出来？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教研组老师对教研组领导的批斗会。

大概是因为看到别的教研组都在批斗的缘故，我们教研组的一些老师串联了一下，也要过过场，要不，显得太跟不上形势了。这个批斗会，通知我们部分高年级学生参加了。

教研组主任做了检查。下面有老师领着呼了几句口号。没有什么过激的行动，最多是敦促老老实实检查交代之类的话语。会开完了，这个场也就过了。毕竟是同一个小单位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也不是很紧张，教师的政策水平也要比同学高得多。

第三节 蒯大富的“干扰”，引起工作组的警觉

在高教部宣布蒋南翔停职检查以后这几天，北京市新市委派出以叶林 1 5 为组长、周赤萍 杨天放为副组长的 5 0 0 多人的庞大工作组陆续进驻清华大学，代行党委职权，领导文革运动。

仅仅几天功夫，要从中央和北京市各机关抽调近万名干部进驻北京那么多的大专院校，工作量够大的，任务够紧急的，效率也够高的，真的如消防车救火、救护车救命一般。

问题是，这批工作组到清华，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我们下乡搞“四清”的时候，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充分的。既有中央文件可指导，又有先前的典型能借鉴。我们这些工作队员只是因为没什么工作经验感觉心里没底，上级领导是胸有成竹的。

而这批工作组来清华之前，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如暴风骤雨般的文革运动，他们也是一头雾水。有哪些中央文件可指导他们？他们掌握了哪些方针政策？准备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对清华情况有什么样的了解？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他们能回答一二吗？

刘少奇后来（1 9 6 6 年 7 月 2 9 日）在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上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1 6 指派工作组的最高长官都不知道如何搞文革，下面的人就更是天晓得了。

周恩来在 8 月 4 日的清华大学师生大会上也老实承认：“我们是仓促决定、仓促上阵，仓促派了工作组，没有仔细考虑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没有很好的交待工作组的根本任务是什么，甚至党的政策也没有交待。整个北京市派到各校各单位的工作组将近一万人，从各地各战线各部门、全国调来，也没有经过学习讨论，又没有详细的交代过政策，交待任务。”

从学生方面说，在校党委垮台以后工作组陆续到校之前，没有人直接领导他们了，他们当然更不知道下面的运动该怎么搞。游斗干部是部分学生无组织的自发的“革命”行为。

工作组打的是一场遭遇战，一场大兵碰到秀才的遭遇战。新市委给学生派来了一个“婆婆”，一个不知道如何当“婆婆”的“婆婆”。

那些工作队员，大多数都是原来单位大大小小的头儿，既看不惯号称斯文的大学生那种有点野蛮的行为，也对同为基层干部遭批斗有一种自然的同情。有的工作队员怕挫伤了学生的革命积极性，隐忍不说，有的工作队员就直言不讳了。

“群众是一群乌合之众，像一群羊一样”、“戴高帽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

不可以这样做。”这些话一经个别工作队员说出口，就迅速公布在大字报上，在校园里流传。工作组进校没几天就与部分激进的学生发生了顶牛。

校园里马上出了一些大字报，如《北京市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现工作组不可信任》、《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革命秩序》等等，刮起了一股小小的对工作组不满的、怀疑的风潮。

在这股风潮中，蒯大富（工化9）也参与其中。他说不上是最早最积极的，但也是相当早的。6月16日，他就贴出了《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犯了严重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说，这股风潮只是少数思想比较激进的学生对工作组没有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表达的不满情绪，既不代表大多数学生的意见，也没有达到反工作组那样严重的程度。不过，这确实标志着危险的火苗已经冒出来了。

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党的代表，真理的化身，那容得学生对工作组表示丝毫不满？要是听任这样一种不满情绪蔓延，工作组还怎么能领导清华的文化大革命？退一步说，连能否在清华站得住脚也成问题。于是，工作组毫不示弱，在把全校几百名干部轰上“楼”（打倒或靠边站）的同时，组织大字报对这股“歪风”进行反击。工作组进校没几天就陷入了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窘境。

6月21日，王光美以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正式成为工作组的一名‘普通工作组员’（自称）”。这是她的“谦虚”之词。她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顾问。所以，她是刘少奇在清华的眼线，也是清华工作组幕后的实际操纵者。十分凑巧的是，她蹲的点正是蒯大富所在的工化系。从此，王光美与蒯大富，成为一对难解难分的冤家对头。

更凑巧的是，本来那天下午王光美要去蒯大富班参加座谈会的，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王光美没去。蒯大富错把另一名来参加座谈会的工作组员当做王光美了。蒯大富感觉是上了当受了骗，懊恼得很，认为这是一个阴谋，于是贴了大字报，质问“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

那几天，对工作组贴大字报的，还有不少。为什么拥护工作组的人独独挑蒯大富在大礼堂进行大辩论？我想，那是因为又是在这个凑巧的6月21日，蒯大富在刘才堂（工化9）的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这段批语够厉害的。这种涉及到夺权的话，在其他对工作组不满的大字报上都不曾提过。

对于工作组来说，学生提点意见，表示点不满，已经是很伤面子难以容忍的事情了，要挑战工作组的权威性，妄图向工作组夺权，那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绝对不能退让半步的。

蒯大富的这段批语触到了工作组最敏感的神经。工作组认为，以蒯大富为首的这批人就是想夺工作组的权，而且背后极有可能有后台。蒯大富后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后来工作组为此不知批了多少次，说蒯大富想夺权。”

6月24日，由工作组策划、由校革筹主任贺鹏飞主持的一场大辩论在大礼堂举行。一方是蒯大富及他的两个同伴，另一方也是三位同学，代表要与蒯大富辩论的那些同学。这一天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表明只经过短短十余天的时间，工作组就倾全校之力，对蒯大富一伙进行严厉的批判。工作组的斗争矛头就此从“斗黑帮”完全地转向“反蒯（大富）”。工作组沿着这

个错误的方向踏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第四节 6。2 4 大辩论，工作组色厉内荏败给蒯大富

6。2 4 辩论那晚，我也想到大礼堂里看现场辩论的。大礼堂里人满为患，我不愿意戳着挤着听，就回宿舍去了。

那晚，蒯大富邀集了两个同学，目标是为追寻“王光美没有参加蒯大富班座谈会的真相”而来的。这本是一个并不复杂的小问题。双方只要把各自所掌握的情况往台面上一摆，事情就很清楚了。因为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阴谋，仅仅是一些误会和某些巧合而已。

工作组方面似乎对澄清真相并不感太大兴趣，也没花多大力气去澄清。他们组织人找蒯大富辩论的目的是为了重现五七年反右斗争时“引蛇出洞”的故伎。工作组在这个时候开始耍阴谋了。因为他们已经把蒯大富定性为向党夺权的右派学生、反革命分子。辩论会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为了打掉他的“嚣张气焰”，杀一儆百，树立工作组的绝对权威。他们集中了全校的力量，足足准备了一整天。工作组方面大权在握，人多势众，蒯大富这边势单力薄，看上去，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辩论会。但是，在大礼堂这一方舞台上，倒是蒯大富显得侃侃而谈，毫不胆怯。工作组虽以势压人，甚至工作组领导轮番上阵，仍然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台下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抱着想弄清楚事情真相来的。看到工作组挥舞着大帽子想压服蒯大富，多有不满意。尤其是周赤萍的一句“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这样大言不惭的话，让他在满腹经纶的清华师生面前丢了颜面。俗语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次是反过来了。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兵（后来才知道周赤萍 1955 年被授于中将军衔）碰到清华这群咬文嚼字的秀才们，即使自以为有理也说不清了。

第二天，我看到在礼堂的大字报区，贴满了评论这场大辩论的大字报。嘲笑周赤萍发言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力挺蒯大富的大字报明显占了优势。不过，到下午，情况发生了逆转。《无限信任工作组》、《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工作组组织的大字报占了压倒多数。清华开始了“反蒋（南翔）必先反蒯”的运动。

上级发话了，说“叶林是中央派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蒯大富的批语是反革命的。”蒯大富被定性为向工作组夺权的反革命分子。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叶林要求全校师生表态，究竟是站在工作组一边还是站在蒯大富一边。这成了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第五节 我对工作组不满意，对蒯大富也不信服

想想自己“四清”分到几十户的小队里，熟悉大致的情况也要十来天。现在工作组进清华才那么几天，我觉得工作组一开始说的做的并无大错。譬如，低年级学生的那些过火行为就应该劝阻的嘛。当然责怪的话不要那么直白。这里是大学生，不是工人或社员。譬如，把清华所有的干部统统赶上楼，先靠边站，我认为也没错的。我们搞“四清”的时候，对一个“烂掉”了的单位（即领导班子有严重问题），也是这样做的。即使没“烂掉”，干部也是先“上楼”（先挂起来，仅保留安排生产的权力），再“洗澡”（检查的意思），然后再“下楼”（解放的意思）的。

我甚至对那些贴工作组的大字报还有点反感。工作组才来了不几天，情况还没怎么熟悉呢，事情还没做多少呢，怎么就可以怀疑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怎么就轻易说工作组不可信任？

在6。24大辩论之前，我对工作组的处境是同情的、体谅的、理解的，对那些不满工作组的大字报不以为然。我并不认为那个时候就开始怀疑工作组是路线觉悟高。

本来嘛，学生这边，对工作组应该多一点耐心，应该接受工作组正确的批评意见。工作组方面，要允许学生对自己贴大字报，对各种意见要认真、慎重的对待，确有错的地方要认错并改正，对个别比较激进的学生要多沟通。

事实上是两方面都是有对也有错。但是两方面都认为自己有理对方有错，都不认为自己有错。工作组自以为是新市委派来的党的组织，哪容得学生说三道四？学生认为自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心要用毛泽东思想的放大镜来检验工作组的一举一动。

在6。24之前，我对蒯大富并没有好印象。我参加运动只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反修防修，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夺权什么的。权是什么？权有什么用处？为什么要夺权？夺谁的权？这些懵懵懂懂不明白的问题，我甚至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工作组刚进校没几天，它是新市委派到清华领导文革的，这点没什么可怀疑的。你蒯大富大谈夺权干吗？难道真的没安好心想夺权？我觉得蒯大富有点张狂，这是我所不喜欢的。

看了许多评论6。24辩论会的大字报，我对蒯大富不胆怯的勇气和雄辩的口才心里佩服。

而对工作组在6。24辩论会上的表现，我很不满意。辩论会上，工作组以势压人，这一点就不能让我心服。周赤萍的讲话明显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嘛！尤其是对“反蒋必先反蒯”的口号，感觉特别类似于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更使我反感。学生中有少数几个人对工作组不过有点不满、有点怀疑而已，并没有要向工作组夺权。即便是蒯大富，他谈到了夺权，但是他说得很策略，也没说立即必须向工作组夺权。工作组马上采取高压做法，把蒯大富那段批语上纲上线到是向工作组夺权的铁证，把蒯大富定性成反革命分子，实在无法让我信服。所以，当班上同学在工作组的组织下揭批蒯大富，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拥护工作组的校内游行的时候，我都没有参加。要我高喊“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把蒯大富当做反革命分子来围剿，我心里通不过。

于是，在那些拥护工作组的同学的眼里，在“不坚决支持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的逻辑下，我就被划到支持蒯大富这一边了。

我一向对党组织的话是非常信任不去怀疑的，这个时候却表现出与工作组不同心的思想。细细想来是有原因的。

就在6。24大辩论的这一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传到校内。我第一次听到“造反有理”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据说，“造反有理”是毛主席的语录！

小时候，我听说过“造反”这个词儿。那是听老人讲“长毛”造反的时候听到的。“长毛”者，就是指太平天国那些起义军。他们都留着长发，在我们那一带，他们被称为“长毛”。老人们说，造反，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大逆不道，是要杀头的！

所以我对“造反”这个词，一直认为是贬义词。在新中国，造反，那是造共产党的反，当然就是反革命啦！

现在，我居然听到了“造反有理”这样新鲜的道理。我瞪着眼睛，晕了半晌都没回过神来，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尽管我的思想一时还没转过来，但一听说是毛主席说的，那肯定是真理，还错得了吗？这个新思想新观念我要赶快接受。

文革初期，既是思想混乱又是思想解放的时期。人们旧有的思想观念一次次地被突破，经受蜕变。过去连对基层的党组织党员干部都不敢提意见的，现在也敢贴大字报了。过去认为清华党委是固若金汤的庞然大物，现在居然轰然倒塌了。这一个个刚刚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件告诉了我，造反并不可怕，造反确实有理。像我这样过去在心里没有一点造反念头的人，也开始敢对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在心里小声地说半个“不”字了。这个“不”，是不再轻信工作组，不再紧跟工作组。

“造反”成为报纸广播、大字报和日常交谈中最常用的一个流行词。“造反有理”慢慢地为大家所接受，并逐步付诸行动。

一股对什么事都敢于怀疑，对什么人都敢于造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即“怀疑一切”）也悄悄地在滋生着、蔓延开来。

在这股思潮下，我对工作组表现了一点不紧跟，不坚信，但是我并没有反工作组。即便这样，我还是成了蒯派 18。当然，比起其他坚定的蒯派，我是一个极其软弱的小蒯派。

第六节 一个软弱的小蒯派，一份不服气的检查

6。24 大辩论以后，工作组在全校范围里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蒯斗争。斗黑帮被搁在一边。斗争矛头向下指向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完全错了。

蒯大富作为反工作组向党夺权的代表人物，在全校范围受到批判和声讨。从各种揭发材料来看，这么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大三学生，俨然已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野心家、阴谋家、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小集团首领。工作组通过外调内查，深挖了蒯大富和他家的老底。蒯大富成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声名狼藉。

在工作组的统一部署下，那些在 6。24 大会上为蒯大富鼓过掌的、写大字报支持蒯大富的、对工作组有过怀疑表示不满的、甚至对“无限信赖工作组”的游行发点牢骚的师生都被检举揭发出来，作为“蒯式人物”进行批判斗争。19

有的学生并没有公开支持过蒯大富，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对工作组的不满，只是因为没写反蒯的大字报，没参加拥护工作组的游行，有的也成了蒯派。

我有个朋友是电机系的学生，他成为蒯派的原因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那天晚上他们班里组织拥护工作组的游行，只因为他已经上床了，懒得爬起来参加，于是就成了班里的小蒯派。

工作组的逻辑三部曲是：“怀疑工作组就是反对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客观上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客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主观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动机与效果完全统一的。”

“工作组接二连三地组织校、系、年级、班级的辩论大会，一步步把蒯派搞臭，并公开对他们实行‘专政’。取消他们行动自由，不许他们写大字报，私拆他们的信件，没收他们的日记，

甚至进行‘隔离性’保护，写交代材料，按手印。”[4—P24]当然，根据每一个蒯派问题性质的严重程度，工作组给予的“待遇”也是有所区别的。性质极其严重的蒯派才被隔离被“专政”。

工作组把蒯派按错误的性质、严重的程度、罪行的大小分成四类。一类、二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即人民内部矛盾，教育教育就过关了。三类的性质要严重一些。要是能认识错误、痛改前非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若坚持错误、态度恶劣，性质就要发生转化，按敌我矛盾处理。第四类，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按敌我矛盾处理。

很不幸，我被工作组定为“四类蒯派”。

我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对工作组，我只是对工作组在6.24辩论会上表现不满意。对工作组不满的话对同学说过，不太支持的行为同学也看到过。这差不多已经够得上蒯派的条件了。如果仅仅是这些，我也只够得上一二类蒯派，不会划为四类的。关键是我不仅有对工作组不满的“现行问题”，还有“近期问题”，更有“历史问题”。所谓“历史问题”，那就是我在“九评”学习的时候就暴露出有那么多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那就是“前科”，说明我对党的离心离德是一贯的。所谓“近期问题”，就是不久前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又散布了一些不合时宜同样是有违党的立场的言论，有些人记忆在心。

像我这样同时有“现行”、“近期”、“历史”问题的，相当稀罕。不要说在班里，即使在年级里，也已经是很冒尖很典型的了。这样的“蒯派”不整，还整谁去？

对我批判的大字报贴在九饭厅前和12号楼的墙上。

我那个时候的胆子很小。一看到我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大字报上，我差一点吓得半死。那种胆战心惊怦怦乱跳的感觉，至今还没忘记掉。一年以后，在团四两派的互攻中，我的名字有时被团派同学写得斗大一般，还受到过名字被打叉叉的“待遇”，那个时候已经是脸皮厚厚、见多不怪了。

6号楼与7号楼之间有一块比较大的空地，那时被开辟为东区学生宿舍的大字报区。我常常经过这片大字报区到大礼堂那边看大字报。反蒯那段时间，我看到许多批判陈继芳（焊0）的大字报，那种尖刻严厉的字眼，让我觉得这个“蒯式人物”好可怕好厉害。后来在总部里见到陈继芳，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个个子不高的低班小姑娘。

说句实事求是的话，我班对我的批判是非常温吞水的，比陈继芳这些大蒯派受到的批判要温和得多多了，更不用说比全校一万多师生员工对蒯大富那种狂轰滥炸的批斗架势。要不，我是肯定挨不过这一关的。所以，我至今心里还很感念我班的同学们手下留情。

几乎所有的蒯派在这种从未经历过的政治高压下做了检讨。也有个别忍受不了的，选择了自杀。我认识我系的史明远老师，一位英俊有为的年青教师，不堪批斗跑到“十三陵服用敌敌畏自杀”了。

自从“九评”学习狠狠地摔了一交以后，我对自己的政治辨别能力已经丧失了自信。全校一开展反蒯斗争，我就知道自己错了。领导一找我谈话，我就马上认错检讨了。我是一个非常软弱的蒯派。

班里同学说我会写点东西。这点写东西的小才，除了写大字报，似乎就是用来反复写检查

了。看来“天生我才必有用”是有点道理的。

我还保存着一份1966年的7月6日写的检查底稿（已经忘了这是第几次的检查了）。巧合的是，一直非常坚定并以绝食相抗争的蒯大富，也是在这一天“写出检查《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蒯大富写的是假检讨，真对抗。我写的是真检讨，假认错。

我的检查一开头，就承认这一个月来，连续犯了二次很严重的立场性错误。前一次，保校党委，保错了。这一次，怀疑工作组，又怀疑错了。

我检查了种种根源，从政治立场、阶级感情、思想方法等方面做了检查，给自己戴上了立场错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个人自由散漫、好出风头等等帽子。

检查的套路已经比较熟了，无非是承认错误、认清危害、深挖根源、改正措施等几大块。

如果检查到此为止，能不能蒙混不知道，但也算是正常的检查。我呢，有点不太识相，或者说，心里还是有点不太服气，于是在最后又多写了好几段我还没有想通的问题：

我说，校党委也是党组织，我相信党，保卫党，怎么会错了呢？我吸取了保蒋保错了的教训，对工作组想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它，怎么又错了呢？我确实是想站在党的立场上的，只是最后，保也错了，怀疑也错了，怎么老是站错队了呢？我很痛苦。

我说，工作组比起新市委比起党中央来，犯错误的概率总要大好多，这“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就是绝对化了嘛，对工作组怎么可以“无限信赖”的呢？

我说，“工作组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信任不信任工作组就是信任不信任党的问题”，这种提法在6.24的短兵相接中，在蒯大富的猖狂进攻面前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两句口号是不对的。因为局部不能代替全局，个别不能代表一般。

我说，毛主席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的这些语录应该怎样理解、怎么执行才是正确的呢？

我一连提了八九个没想通的问题。我最后写道：“以上谬论种种，希望组织和同志们批判。”

在这份交给工作组预审的草稿上，对上面这许多我想不通的文字，审稿的领导用波浪线重点划出，有几处还打了大大的问号，在边上还批注着这么一句话：“信任群众信任党是具体的不是空洞的。黎”。这位姓“黎”的领导是班里的还是年级里的或者是工作组里的，我就分不清了。这无关紧要。我能想象得到，这位姓“黎”的领导对我的检查是多么的不满和生气，一边看一边忍不住就在我的草稿上旁注批驳了。

我不知道工作组看了我的这份检查稿以后是怎么讨论我的问题的。是认为我对组织很老实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还是认为我态度不老实表现很猖狂借检查之名行向党反扑之实？

与我同宿舍的有一位老章，他也是从农村来的，是我比较信任的党员，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在这段时间里，他常常来找我个别谈心。我对他毫无戒备，心里想什么就谈什么。他套我什么我就如实说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火力侦察”的，他们在整我更多的材料呢。

我父母一贯训导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说我这个人，没有害人之心是好的，连防人之心也没有，特别缺心眼。我在“九评”学习后曾经发誓要牢记“祸从口出”的古训，但是，事到关键时刻又都忘得干干净净。

工作组接下来打算如何更严厉地整治我，我当时并不清楚。工作组撤走以后，有个知道内情的同学悄悄地告诉我，我被定为“四类蒯派”，本打算在年级的范围里批判的。只因为反蒯紧急刹车，工作组匆忙撤走，我才只遭受了小难躲过了大劫。

我当年也想过，要想保险点、安全点，就得随大流，随主流。组织上叫我怎么说怎么做，我就怎么说怎么做。那样肯定不会有大的错，肯定不会挨整。工作组要反蒯，大家都跟着工作组反蒯了，我也应该跟着反蒯。即使最后错了，最多也是认识问题。大多数人都错了，法不治众嘛，挨整也整不到我这样的群众头上。

这个明摆着的现象我是看到的，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也懂得的。可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一来，每到关键时刻，我总是憋不住要想说一些与多数人、与主流不太一样的东西呢？为什么明明知道这样会挨整而不接受教训呢？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琢磨自己，一直没有完全想明白。

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幼稚可笑书呆子气十足的人来谈什么坚持真理之类的大话，肯定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尽管我自己确实认为是在坚持真理）。从小父母亲就教育我要做一个忠厚老实不说谎话的好孩子。小学里的老师教导我们要做诚实的好学生。到了高中大学组织上要求我们忠诚老实对党交心。我把诚实看成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德。我觉得，在我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要我违心的去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我会感到很憋气，很难受。我每每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讲真话冲动，一定要把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说了真话才安心，才顺气。每次挨整以后，就痛定思痛，告诫自己今后千万别这样了。但是，过了一阵，好了疮疤忘了疼，每当大事来临，又是控制不住自己。

还有一点，我比较认死理。这可能与学工科的有点关系。习惯逻辑推导，习惯理性思维。在政治的角斗场上，这肯定是要碰壁的。

参加文革才两个月，就喝了两口水。打击很大，信心受挫。伟大领袖要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的号召激励着我。我没有气馁，我还要继续战斗。

第七节 “怒涛”战斗组，被指责是“地富反坏右”的大杂烩

在工作组进校一段时间以后，班里的同学三五成群自行结合组织起了战斗组，以战斗组的名义写大字报。

对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我发自内心的拥护，积极地参加。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就是想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经受锻炼，好好表现，以实际行动改变组织上对我的不良印象，做一个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能参加一个战斗组肯定比单枪匹马的个人单干要好得多。我盼望着有人来找我，把我吸收到他们的战斗组里去。但是没人来招呼我。

环顾四周，大多数同学都已在战斗组里了，全班只剩下不多的几个人，有点形单影只。

尽管我知道自己已经很落伍，但是我多少也是有点自尊心的。要我主动去问“你们要我吗？”

万一吃个软钉子，我面子上下不来。我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既然别人不愿意来找我，那我就去找那几个剩下的人去。这么一串联，很快，一个由我和老许、老贺、老史、老林共五位同学组成的战斗组成立了。既然是由我串联起来的，我也就不客气了，以组长自居。

那个时候想当个组长之类的绿豆芝麻“官”，自封就是了。本事全看你能招募到几个人，别人愿不愿意做你的“兵”。

我给战斗组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怒涛”战斗组。寓意就是文化大革命犹如汹涌澎湃的怒涛，荡涤着一切“封资修”20的污泥浊水！我们就在这大风大浪的怒涛中，跟随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我在大学期间比较喜欢写日记。往往在晚自习开始前，隔三差五的总要写点东西。所以，虽然文笔不怎么样，没什么文采，但是出手比较快，这方面比其他的几位同学要强一些。

大家讨论后，如果观点比较一致，想要写点什么了，多数都是由我执笔起草，然后再誊写到大字报上，用“怒涛”战斗组的名义贴出去。如果讨论的意见统一不了，我就用我自己的名字在大字报上署名。

当时学校里已经陆陆续续涌现出几百个战斗组。我这个战斗组并没有写过什么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字报，贴的数量也不多，是个不起眼的为大家所熟悉的战斗组。

倒是在班上，在年级里，我们这个战斗组引起了一些阶级觉悟很高敏感性很强的同学的“重视”。“重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写的大字报观点多么新颖或偏激，而是我们这个战斗组的成分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很快，我听到了一种议论，说我们这个战斗组是集“地、富、反、坏、右”之大成的大杂烩。

听到这样的风言风语，大家都感到很大的压力。开始我也很气恼，后来琢磨了一下，果真有那么一点儿影子。情况原来是这样的：

老贺，他是一位早在高中时就入党的老党员，也是班里的干部。照理说，我们这个战斗组里就数他的政治条件最好的了。他怎么也会孤单的呢？原来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因此，这么多年来他为人处事一向小心谨慎。他与“富”字沾上边了。

老林，听说曾经有过私“拿”别人饭票的不良行为，是班里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们重点帮扶的对象。是不是因为这就认为他有点“坏”？

老史，他家是农村的，父亲是大队干部，听说在“四清”运动中受到了冲击。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对这件事很有点想不通。要是他爸爸真有问题，就是“四不清”干部了。

还有老许，他来自上海，出身好像是高级职员或小业主什么的，我不敢肯定，能肯定他不是红五类出身。那么他与“资”沾了一点边儿？

最后是我。虽然我的出身是这几个人中最过硬的，但是我在组织的眼里是认识模糊思想“右倾”，与“右派学生”相差无几了。

五个人，要完全套上“地富反坏右”，肯定有点牵强附会。但是，我班以工农子弟占绝大多数。我扳着手指数了一下，家庭成分差一点的或者本人毛病多一点的，真的都集中在我这个“怒涛”战斗组里了。也难怪我们这几个人都没人主动要我们，都感到有点孤单。现在，成立了战斗组，不孤单了，但是一看到别人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们，心里就特别的郁闷。可是，又没地方可以倾诉的。

其实我们这几个人，讨论问题的时候观点经常不一致的。我们并不是因为志同道合而组成的战斗组。我们更多的是因为感到像个弃儿，害怕孤立的状态，害怕孤独的感觉。所以，并不是我有多大本事把其他的几位召集在一起，而是我们此时的处境和心情相差不多。结成一个战斗组以后，就有一种抱团取暖的热度。在这个“家”里，一起讨论形势，对学校的时局发表看法和评论，交换各自得来的消息，尽管不一致的看法很多，但是总比孤魂野鬼似的一个人游荡要好得多。

当然，我们之间还是有不少共同点的。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听从毛主席的号召，想积极参加文革，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的。这一点，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别人可不管这些。我们这个战斗组存在的本身，就引来了一些人的议论和警惕。他们可能在想：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是不是要趁着文化大革命来造共产党的反呀？尤其是我这个战斗组长，更受某些人的非议。

有次，我从外面回到12号楼，走上楼梯，快到四楼的时候，从靠楼梯口开着门的那个套间宿舍里（即427/429），我听到有个很响的声音传出来：“那个孙银基又写大字报了！哼！太猖狂了！”

我听出那是兄弟班的一个姓王的革干子弟（该同学后来是“自控系红卫兵”的主要骨干）正在激动地对别人嚷着。这一声“哼”的粗重鼻音中，我听到的全是鄙夷和不屑。

我没吭声，因为我不习惯面对面的质问和对骂。但是我心里非常愤慨！我贴大字报又怎么啦？我写大字报是毛主席给我的神圣权利，你管得着吗？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贴我的大字报来与我论战呀！你何必在背后指责我啊？

我心里实在气不过，回到宿舍，我就奋笔疾书，用小楷写了整整一张大字报，贴在四楼西头楼道口的墙上。

我的这张大字报，尽管没有漫骂，但是用词也是尖刻激烈的。我好像是一只被激怒了的公鸡，鸡冠毛都高高耸立起来，向着对我背后中伤的这些人狠狠反击。

这是我在文革中措辞最为激烈的一张大字报，所以印象非常深刻。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以后，上面有不少同学的留言和批注。有指责我的，也有比较公道替我说话的。过了几天，我把这张大字报揭下来保存了好一段时间，可惜现在已经不知所踪了。

我听到的非难，我可以反击。但并不是所有的暗箭都能预防的。譬如，当我被人揭了老底的时候。

第八节 被揭老底，我的“癞疮疤”全校皆知

那个时候的大字报上，除了以战斗组署名的以外，个人署名一般都是真姓实名，极少用化名的。经常能在大字报上看到一些批注。谁看了某篇大字报后，如果有话要说，有感想发，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这篇大字报的任何空着的地方（往往是在文章的最后）写上一段话。“好得很”、“对极了”、“狗屁不通”、“坚决支持”等等都是最常用的简洁批注语。

凡是以我的名字署名的的大字报贴出去以后，过半天一天回过头再去看看，也会有一些人在我的大字报上批注。其中总能见到这样的一些批注：“此人在‘九评’学习时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此人‘九评’学习时在全班做过检查”等等。这批注用一个大大的箭头指向我的名字。

那个时候，这种揭老底的手法是惯用的。甚至还有取名为“揭老底”的战斗组。祖宗三代、小偷小摸、检查处分、个人隐私都是揭老底的内容。所以，一般出身不好的同学都不敢也不愿写大字报，就是因为怕被知情人揭了老底，自找不自在。

我出身没问题，所以我敢于写大字报。但是，“九评”学习是我心头永远的伤痛，就像那块阿Q头上的癞疮疤。我也非常害怕别人揭我这个老底。

这些批注都是同一个人写的。这笔迹我非常熟悉，因为这是我同宿舍的老祝写的。他写的字与众不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批注并没有造谣，所以我没法向他“兴师问罪”。但是，这样的批注让我非常难堪。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脸面没有了，又无处发泄，你说窝火不窝火？我心里的无名火无处可发。

我也是在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难道我写大字报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行动有错？要是你不同意我的观点，你也可以写大字报与我辩论呀！干吗老是揭我的老底？我也像阿Q一样，心中忿忿不平。

“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你。我把大字报贴到你找不到的地方去！”我心里暗自思量。

写大字报，当然是希望看到的人越多越好。贴到没人看到的地方，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写的大字报，最早贴在12号楼附近，后来就贴到大礼堂区。那是清华大字报的中心地带。

既要贴在礼堂草坪周围的大字报区让更多的人关注，又不想让老祝找到，我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有意识地今天贴在东南角，过几天贴在西北角，在不同的地方贴。让我惊奇的是，我写的大字报无论贴到哪里总能被老祝找到，总能看到他诸如此类的批注。我懊恼不已。我想，我是被他死死地盯上了。

真像个可恨的小特务，像个无聊的大喇叭，像个甩不掉的小尾巴，像个《悲惨世界》中那个穷追逃犯的讨厌警长。我搜刮所有解气的字眼在心里骂他。本来嘛，我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也只有班上同学、教研组老师，最多还有同年级的少数同学知道。这是我最怕提起、最想保密的隐私。现在，经他一宣扬，变成全校不少人所共知的丑闻。我气愤、我郁闷、我也无奈。我不知道这仅是他个人的爱好所为，还是他受工作组指派的受命之举。

绝大多数同学对这种揭老底刨祖坟的手法是很反感的。一段时间以后，我看到在我的大字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批注：“干吗老是揭别人的老底呀？”、“四大21是毛主席给的权利，你这样是不是不让人家说话呀？”、“老揭别人的短，可耻！”这些批注的箭头又指向老祝的批注，表达

对他这样做法的不满。我心想，世上毕竟还有讲公道的人。这让我心里感到一丝温暖、一点慰藉。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大字报，你写的批注被他人批注了，他人的批注又被别的人再批注。箭头指来指去的，有好几重，很像一幅攻防的军事地图。这也是当时清华大字报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久而久之，我也慢慢习惯了老祝的批注。我的老底也就是这么一桩，这么一件破事情。他的批注没有更多的新意。丑事既然已经公开了，就得慢慢地习惯、适应。我还得革命，我不能因此而畏缩不前。度过了最初一段有点惊恐的日子，慢慢的我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害怕、担心、慌乱了。但是，我精神上所受到的压力，始终在心头，感到沉甸甸的。我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这件“不光彩”的事情第一次从班级走向全校，全拜老祝批注之托。至于第二次，后文还要提到。文革以后，我觉得老祝那时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早已不再介意这样的小事一桩了。

文革中，不全都是烦心之事。偶尔，也有可乐之事。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 【读史笔记】

#### 文革春秋

• 周家琮 •

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少读《孟子》，对“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句，颇为存疑，窃以为又是孟老夫子的夸张。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尚不能阻挡“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区区几篇被王荆公后来讥为“断烂朝报”的鲁国史稿，岂能吓退“乱臣贼子”？及至文革，得以见识春秋历史，如何充当权谋政治的利器，将政敌杀得落花流水。自此叹服《孟子》所言不诬。

文革发难，点来祭旗的乃明史专家吴晗。姚文元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檄文，定了吴晗以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替彭德怀翻案的滔天大罪。可怜吴晗对党和领袖一片忠心，早已和清华大师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分道扬镳，笃行史学为政治服务之宗旨，却率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吴晗的“三家村”同党邓拓、廖沫沙，亦难逃借古讽今恶毒攻击之罪名，被揪出批判，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其时凡涉笔历史题材的文人，无不冠以同一罪名，被斗得不亦乐乎。替本为文革主攻对象的“走资派”们，颇挡了一阵子枪林弹雨。

借古喻今虽是文革初期的一大罪名，但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却可以成为文化革命的重型武器。文革前夜，戚本禹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借考证李秀成降敌叛变，影射瞿秋白被俘变节，矛头暗指党内高层。此文与戚氏另一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皆深得领袖首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吹响了文革进攻的号角。紧接着

6月3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又扯出史学旗帜为政治斗争摇旗呐喊。及至1967年，对刘少奇见报的首次变相点名批判，还是借道戚本禹批判历史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本为武器批判高手的林副统帅，也祭出批判的武器，在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上，罗列了一连串烛影斧声、政变夺权的历史案例，杀气腾腾地渲染政变政情。伟大领袖闻之虽称不安，但其后就有了关于“二月兵变”的流言。一直到文革后期，褒王安石以挺文革；贬宋江剑指“投降派”；孔夫子陪绑副统帅再遭批判；秦始皇和法家被捧到天上。文革大戏的每场演出，几乎都不乏历史的幽灵登场。

以文艺和学术为政治工具，文革先锋的几个秀才并非始作俑者。样板戏的前驱及指导思想，可溯源至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延安时期。史学从学术的“道”沦为政治的“器”，同样有其革命历史。延安时的陈伯达，写过指桑骂槐讨伐蒋介石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善跟形势的郭沫若，也在重庆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及时敲响警钟而得领袖推介。只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并未因一片苦心的借古喻今而改变。郭氏为抨击秦始皇的现代版蒋介石，还写了本貌似历史著作的《十批判书》。然而长于戏说历史的郭老却被历史戏弄，二十多年后该书因不合文革需要，反被钦定为“《十批》不是好文章”。1948年吴晗所作《朱元璋传》，亦可窥见对蒋氏黑暗统治的影射。其实吴晗写《海瑞罢官》，本乃风闻领袖赞扬海瑞，为迎合圣意服务政治所为。与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文章、曹禺的话剧《胆剑篇》、若干画家的颂圣之作，皆异曲同工。岂料却被选为进攻突破口，作了文革炮火下的冤魂。学术为专制政治服务之险恶，亦由此可见一斑。

沦为政治工具的历史，倘要得心应手随心所欲地运用，自难拘泥于史实。在所谓“以论带史”的招牌下，歪曲史实践踏历史，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为证明无产阶级司令部伟大光荣正确由来已久，而“走资派”早就是机会主义或叛徒内奸工贼，从安源罢工到井冈山会师，从遵义会议到西安事变，重大历史事件本已模糊不清的面目，被肆无忌惮地进一步歪曲篡改。为了文革旗手江青的历史伪装清白，甚至不惮毁灭史料、置见证人于死地。历史造假运动中，被诬者有口难辩，知情人噤若寒蝉，历史遭到最无耻的践踏。歪曲历史为政治服务，本乃专制文化的传统历有师承。孔子标榜“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隐恶迹以扮厚道，却霸道地“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门徒子贡也明白：“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对此心中有数，提醒人们“尽信书，不如无书”。太史公批评别人“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有瞎编之嫌。但《史记》中近乎文学想象、尽显一己好恶之处，却也比比皆是。自隋文帝禁私史，秉承王败寇之宗旨，替当今主子文过饰非的官修史书，更不在话下。民国以降，国民党对辛亥之役贪天功为己有，对党魁独裁、通款东瀛、帷薄不修等皆讳莫如深。延安时期，既以满纸谎言、令人作呕的联共党史为权威教材，同样亦步其后尘，将重构党史作为整风的重点，并以此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党史自此开始注水，直至发展到文革的大规模历史欺骗。

与造假并列，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另一手段，是所谓的“托古改制”。在言必称三代的古代中国，改革祖宗法度，自属大逆不道。要争取改革合法性，除了假天象伪称天意，只有托古人以扮神圣。王莽搞土改，蓝本是莫须有的古“井田制”。大言“祖宗不足法”的王安石，其实也如政敌所云“好学而泥古”。变法中推行的“均输法”，学的还是西汉桑弘羊。康南海闹变法，也要下功夫攥二本《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用今文经学的“三世”“三统”，为变法思想寻找历史资源。甚至到了大跃进年代，自诩“鄙视过去迷信未来”的领袖，为证明人民公社乃古已有之的良策，还搬出东汉时的“五斗米道”，推荐给高级干部以资借鉴。文革标榜继承古代变法精神，颂扬商鞅王安石的闹剧，皆与之一脉相承。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今中外的人们，都从历史中吸取宝贵的思想资源，以史为鉴也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但借“古为今用”之名，肆无忌惮地伪造历史，“影射史学”盛行，历史赤裸裸地沦为权谋政治的工具，在中外历史上却十分罕见。文革发动者曾构陷他人，说“利用小说

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其实借春秋史事，作为政治斗争重要武器，倒是文革的一大发明。与副统帅的“四个第一”等，皆可归入其“有所发明”之序列。所可疑者，是文革发动者虽满脑子帝王将相，但历来自诩厚今薄古，鄙视先人。文革初期的社论文章，无不狂呼踏倒三坟五典，誓与传统决裂。何以每至文革重要关头，却都偏好借春秋史事，来发动现实的政治斗争？

原因也许有很多：中国历史悠久、史料资源丰富；领导人鄙视言必称希腊、也不怎么引证马列但谙熟旧史，言及中国赫鲁晓夫时，还不忘赵匡胤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历史故事和戏文为百姓喜闻乐见，便于运动群众；附庸于皇权政治的史学传统，和“王前巫而后史”的史官文化等。但深层次的根本原因，也许还是长期军事斗争的传统，以及文革之际的政治格局，决定了文革借道所谓历史学术批判，迂回攻击的斗争策略。正如工程师出身的官员热衷“工程”，相信人才教育、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皆可借各类工程造就。1949年之后，执政者囿于长期军事斗争和地下身份的惯性，未能跳出“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窠臼。怀疑一切夸张敌情、领导人警戒森严、政务过度保密，皆沿袭了尚处于地下时的心态。沿袭军事斗争发动战役的方式，以政治运动代替国家治理，经济、文化、政治方针，皆以惯用的群众运动方式实施，文革时登峰造极，相沿成习迄今余绪未了。翦除妨碍“继续革命”的同僚，伟大统帅采取自称“剥笋子”的手段。而高饶、而彭黄张周、而彭罗陆杨、而刘邓，取法兵家梯次展开、各个击破之策略。整肃罗瑞卿，被通知与会的元帅和中办主任，会前居然相互打听不知会议何为，亦合兵不示形、突然袭击的战术。最具讽刺意味的，当数文革后期“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诲，言之谆谆者正是众所周知的谋略大家。其“引蛇出洞”的反右妙计，更是“兵不厌诈”的经典。有何种内政就有何种外交，1958年将访华的赫鲁晓夫蒙在鼓中，却造成炮击金门有苏联背书的假象。虽一时将其玩弄其于股掌之上，然大国外交行诡诈小计，是否中苏交恶的原因之一，亦恐一言难尽。所以文革之役伊始，并未取正面进攻的态势，而是借道历史批判声东击西、迂回包抄；在派工作组问题上诱敌深入；在攻击敌营时梯次展开；以地下方式派江青去沪组织文章，皆为用兵之道。

当然，文革之初没有贸然正面进攻，除了对兵者诡道的擅长和爱好，也取决于文革之际的实际政治格局。格局之一是党内政治力量的对比。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已经显示，党内多数并不赞成极左路线。文革发动者虽吹嘘动动小指头就可以打倒政敌，但文革伊始要一下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打倒大批党内军内所谓走资派，全面推行文革路线，以党内民主方式决策并无胜算。诚如李鸿章论及对日之战时所言：“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前有袁项城称帝错估力量对比不远的殷鉴，后有赫鲁晓夫被同僚赶下台晚近之教训，战略大家岂会掉以轻心。于是除了采取迂回斗争策略，文革前夕还成立“首都工作组”，充实京畿卫戍，以军事领导任文革副帅，真正做到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尽显军事家缜密之谋略。文革之际政治格局的另一特点，是所谓一线二线非制度化的二元权力格局。形式上一线刘邓主持工作，实际上二线通过政治运作和个人崇拜依然大权在握。形式上党内决策有民主制度，实际上还是老大为所欲为乾纲独断。另一方面，文革发动者虽自诩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迷恋于不按规则出牌，但一线的存在和合法的程序，却还不能完全绕过和马上推翻。虽似已君临天下，但离秦皇汉武的予取予夺，虽心向往之却相距尚远。痛斥政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正是上述尴尬心态的反映。于是，古为今用的春秋手法、迂回包抄的秘密策划，便成了文革发难的不二手段。而与之类似的二元权力格局，自遵义会议之后几与党史相伴。流毒至今，又演化为废除领导终身制与退而不休的名实相悖，成为实现政治透明有序、安定团结长治久安之大碍。此种表里不一、名实相悖的二元社会现象，不但存在于高层权力结构之中，在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亦随处可见，还蔓延至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潘汉年案胡风案已经钦定结果，却装模作样履行审判程序披上合法外衣。小至以徒具虚名的招投标掩盖内幕交易，大至领导人退休年龄、选票多寡入局划线的权变，皆在显规则牌坊之下，掩潜规则运作之黑幕。且表演者行之若素不以为耻，围观者习以为常不以为忤，由此政治道德的沦丧，社会风气的败坏则毫不足怪。

老子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贾谊说：“攻守之势异也”。从造反者到执政者，观念和行需要实现根本的转变。政治透明公开、运作规范有序，方可谋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然文革发动者却背道而驰，昧于革命和执政攻守迥异之势，政权于“马上得之”，以为仍可“马上治之”，热衷继续革命，醉心玩弄政治权谋。从整风反右的转守为攻、所谓居二线的以退为进，到文革初期的迂回包抄、坐山观虎斗，雄才大略挥洒自如。后果却是国乱民穷、灾难深重。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尤其党内民主固然有了长足进步。然毋庸讳言，酿成文革惨剧的体制基因并没有得到根除，言行相悖表里不一、思想浅薄却热衷权谋的文革遗风仍沿袭泛滥。一面高唱权为民所用，一面肆意挥霍纳税人血汗。左手高举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右手送子女入国外贵族学校。环顾政界商界学界，乃至体育界慈善界，“运作”、“勾兑”成风，厚黑学成功学大行其道。商场官场皆战场，迷恋于孙吴兵法、申韩术数，挂显规则之羊头，卖潜规则之狗肉者，代有传人。经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产生交易成本高昂的柠檬市场。经济前景不确定，导致投资衰退经济活力降低。政治运作的不透明、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既助长官场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更驱使人们用脚投票纷纷逃离。谋划今日之政治体制改革，对权谋政治必然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不可不察；对文革时代政治文明的败坏及遗毒，不容忽视；对文革领袖的权谋乱国，更有必要加以揭露和批判。清除文革政治毒瘤，是政治体制改革难以绕行和逾越的一道坎。

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人们借春秋笔法影射现实。在专制统治的岁月，阴谋家利用历史玩弄政治权谋。虽然这一切也许正在成为历史，但只要所谓政治挂帅、以革命的名义无不可为的核心价值观，得不到反省和清算，利用爱国、利用反腐、利用为民请命、乃至利用唱歌玩弄政治权谋的闹剧，仍将不断上演。文革春秋，其无后乎！

□ 原载《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13 年 2 月第一版

~~~~~

【千秋功罪】

还原历史的真实图景

• 秦 晖 • 傅高义 •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傅高义：社会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

2013 年 4 月 23 日，北京大学

◇ 邓小平的贡献

傅高义：

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北京大学斯坦福研究中心，并见到这么多老朋友。大家可能知道，当初我写这本书（指《邓小平时代》——编者）的初衷是给美国人看的。当时我在哈佛写这本书时得到了很多基金会的支持，甚至还有政府的支持，所以我想，我的责任不仅是对学校的，更是对全社会的。退休后，我想写一些能让更广泛的美国民众受益的东西，让他们能很好地了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的人民能跨越文化障碍并进行更好的交流对 21 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学者，我想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帮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改革、发展、开放的模式。我想用最平实的、最直接的英语讲述，以方便普通群众了解这一切。在英文版出版之后，一般的反响是比较好的，但有一些书评是批判性的，他们认为我忽略了一些事情。这些都是有趣的批评，而历史的转变也同样令人玩味。这些忽略使大陆中文版得以顺

利出版。虽然做了一些调整和修订，以适应宣传的需要，但我的观点和故事基本上保留下来了。

我认为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上，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裕，更重要的是城市化，从而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以及整个中国市场的开放。在我看来，中国一直都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但它从来就不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直到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一些开放的时期，但只有邓小平时代才是完全开放的、鼎盛的时期。他把中国同国际体系完全连接起来，但同时也留给中国的格局中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可以建立起一层层紧密联系的领导体制是很重要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利用各种规则、规范去管理领导人也是如此。比如，现在社会中的腐败问题就是邓小平当初想要建立的这个体制中可能出现的。同时，如何通过引进国外的法律来完善国内法治建设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

直到1980年前后，很多人还在担心会不会受到“文革”的影响。为此，邓小平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如果地区上的官员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他就不会再去严厉地惩罚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当然，他也希望能够约束官员，不让他们把挣到的钱只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也就是打击腐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问题现在仍然存在，但这也说明现在仍然处于过渡时期。我认为邓小平就像是一个“总经理”，他是很有能力的管理者。说他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并不确切，因为他似乎并没有一个关于改革的宏伟蓝图，而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在我看来，邓小平只是在此过程中去管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并对这个过程进行指导。

秦晖：

我觉得刚才傅高义先生已经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英语世界对他的这本书评价很高，但我们的朋友却有一些批评。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刚才他已经讲了，他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所以自然就不需要对美国人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进行启蒙，甚至也不是对中国人的启蒙，因为他的初衷不是这样。尽管如此，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还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30多年，甚至60多年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在西方听众中大受欢迎，其实在中国也很受欢迎，虽然有些观点上有争议，但作为一个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但是我觉得关于邓小平乃至中国改革史，因为中国改革还远没有结束，绝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评价邓小平，或是说评价中国改革，因为这是他的主要贡献，但是要理解中国改革乃至理解改革中邓小平起的主要作用，我觉得改革前的历史是要谈的，即如何从“文革”到改革。虽然这本书直接谈论这一过程的篇幅很小，但其后很多对改革的描述都是与对这一段时间的分析有关的，甚至关于一些人的定位。比如说傅高义先生书中经常提到“造反派”这一概念，其中把很多“文革”新贵比如迟群、谢静宜也叫做“造反派”，这当然是邓小平时代的理解，因为他否定“造反派”当然就包括否定这些人，可是我们知道，迟群、谢静宜到清华本来就是去镇压“造反派”的。很难说他们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造反派”。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文革”，开创了改革。这个过程遗留下很多问题。有一句1980年代我们经常讲的话，叫做“彻底否定‘文革’”。这句话现在已经很少讲了。我觉得这句话没错，我们还要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而且最近出现的一些事情使人担心中国未来出现类似“文革”的状况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所谓“彻底否定‘文革’”除了所谓“彻底”与否可能有争论，有人觉得应该重讲“文革”的苦难史，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研究“文革”的发生机制以及如何摆脱“文革”。今天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前人，历史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是难以避免的，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的确要指出邓小平的“彻底否定‘文革’”带太多的“当权派本位”色彩，他把“文革”描述成了老百姓整“当官的”、“造反派”迫害“走资派”这样一个过程。“造反派”迫害“走资派”变成“文革”的单一情景是非常大的一个

问题，这就是把“文革”中稍微活跃一些的人都叫做“造反派”，其中包括迟群、谢静宜。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事实误判后来又另外一些朋友从另外一个方向强化了。我们的一些左派的朋友，甚至是“毛左派”的朋友现在也是这么讲的，认为“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官的”，区别只在于邓小平说这样做是“整错了”而他们认为是对的。

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确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这样的“文革”图景给老百姓以强烈的印象：既然“文革”就是“整当官的”，而当官的又是如此腐败，那“文革”不是很美妙或很浪漫吗？现在很多大学生对“文革”有这样的浪漫幻想。邓小平时代否定“文革”的官方叙述与毛左派虽然在价值观上是对立的，但在事实判断上好像一样。所以使我们现在的“文革”话语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关于“文革”的官方话语现在讲得是越来越少。确实，如果总是讲“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官的，那只能增加人们对“当官的”的同情，而同时“毛左派”的朋友们说：“就是应该再来一场‘文革’，这是老百姓对于‘当官的’一种惩罚。”这就形成了一种合唱。

如果我们要真正看懂“文革”乃至走出“文革”，就必须看到另外一种故事背景。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做的和说的往往反差非常大。比如邓小平说：反右是对的，只是不该扩大化了，但此时99%的右派都已经平反了。又比如毛泽东一直到死都认为“造反”是他的伟大贡献，就是靠“造反派”打倒走资派实现了中国的革命，其实能够活跃到邓小平时代的“造反派”还不到总人数的1%，大多数“造反派”不是在邓小平时代，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就被打倒了。但是这个事实却被遮蔽了，似乎官方叙述和毛左创造了一个神话：毛主席支持“造反派”，邓小平镇压“造反派”。其实哪有这么回事？北京人都知道那“五大领袖”都在毛泽东时代就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我的家乡广西，“造反派”更是被屠杀、甚至被活活吃掉的地方！1968年的血腥夏天，香港、澳门的人都知道从西江上滚滚而下的尸体，有十几万之多。那些是什么人呢？都是“造反派”。他们是怎么死的？都是当权派用“官方民兵”甚至解放军对他们进行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以前我们说“否定‘文革’”时都不提的，所以“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定要讲的。

小平的贡献，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本人都是感同身受的，但是我的确觉得“改革”这件事情换一个人做也差不多。我觉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确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但是我所说的角度和毛左派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改革这个奇迹的发生的确是有赖于“文革”这样一个奇迹，“文革”这个“奇迹”奇在什么地方呢？我改造了一个经济学术语，叫做“负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说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有些人得利多，有些人得利少。而“文革”十年，把中国所有的阶层都得罪了：从当权派到“造反派”，从汉族到少数民族，从高干子弟到狗崽子，从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到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帕累托”过程，没有得益者，只有吃亏多少的问题。所以，走出“负帕累托改进”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

中国1980年代的共识，其实不是关于中国走向何处去的共识。这个共识从来就没有过，现在也仍然没有，而且历史上所有重大改革都很难建立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走向哪里？这是一个永远都有争议的话题。而且说老实话，成功的改革也不必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完全可以采取把不同意见在体制下加以调和的态度。中国改革这30多年，成就巨大，但问题也堆积如山。现在的人们不会对改革抱有很大幻想了，加之“文革”叙事的片面性，现在的人们看待改革和“文革”肯定与1980年代不同。我们怎样在不同的基础上还原事实，还原真相，使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使今后的道路沿着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延伸下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傅高义先生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切入点，让我们得以重新看待邓小平以及1949年以后60多年的中国历史。

◇ 没有两极分化的转型

傅高义：

我想讲一下邓在摆脱“文革”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和美国内战后很像。邓小平所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两极分化，他不因为毛的历史问题对他进行批判，并且上升到“可以批评毛，但他依然是伟大的”这样一种高度。他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不再搞阶级斗争的党。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说：已经建国28年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考虑阶级的问题，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这些普通人去参加考试而后择优录取。就这样，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推进革命的做法，只是说：时代变了，我们应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了。我觉得邓小平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在“文革”后，没有让社会格局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转变，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但是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比我更详细。

有些资料说明，毛泽东总在猜疑别人会攫取他的权力，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毛和邓1970年代以及毛泽东生命中最后10年的关系，毛泽东死后发生的那些事就显而易见了。毛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都用来试图阻止自己去世后发生的这些事。我觉得他应该能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自己死后邓小平和刘少奇会做什么，在大跃进后期他就应该已经明白自己成了少数派，综上所述，毛其实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反对他的人也要依赖他所取得的成就。

秦晖：

我刚才的话并没有贬低谁的意思，毛也好，邓也好，我只是想讲述这些事情的另外一面。刚才我说了，中国的事很有意思，邓几乎给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却仍然说反右是对的；毛几乎把所有的“造反派”都收拾了，却仍然说“造反派”是伟大的。留到邓时代的“造反派”已经是少数，并且都是以镇压其他“造反派”作为自己的“投名状”。熟悉上海“文革”史的人都知道，王洪文不是在一月以前的造反中最活跃的，而他后来被选中是因为镇压上海“造反派”。绝大部分“造反派”在毛时期就被镇压了。当然，我绝没有为“造反派”邀功买好的意思，他们的思想当然还是很左的。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其中很多是为在毛泽东时代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尽管邓在理论上把“造反”当作“文革”最重要的罪行加以否定。这其中有很多不仅被平反，还有被作为烈士褒奖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文革”时期被当权派镇压的“造反派”。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张志新是为反对整刘少奇而被杀的，用那时的话说是“保皇派”，但其他几个都是“造反派”，如遇罗克、李九莲，而且都是在恢复“文革”后秩序时被屠杀的。遇罗克是《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中学文革报》本来就是“造反派”报纸，反对“保皇派”的。广西更不用说了，1983—1987年间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处遗”，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主要就是清算以韦国清为首的当权派对广西4·22“造反派”的大屠杀。而这个活动就是在邓小平时代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要弄清楚从“文革”到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底线。当然，我完全理解傅高义先生，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许也会采取邓小平这样的办法，因为这样有利于政治的连续性。但是这里要说一下，在1980—1981年否定毛的呼声比1956年苏联否定斯大林的呼声强得多。如果说赫鲁晓夫对否定斯大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沿着1977—1978年的路线走下去，否定毛是很容易的，在我刚才讲的“负帕累托改进”背景下，全社会这方面共识是很强的，但是那时却没有做这件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还原历史真相变

得更遥不可及了。首先因为这30多年，改革中的弊病，尤其是“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造成的问题很大；第二则是由于我之前所说的“文革”叙事法；第三是因为“文革”中的一辈正在渐渐老去，他们的意识正在被淡忘。这种情况不仅在现在看来非常奇怪，就是邓小平当初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我潜意识里有一种想法，也许邓小平是想把这个问题留待后人解决。但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这就需要大家继续思考了。

傅高义：

我有几点看法，第一，有些人批判文化大革命，希望返还他们的财产。邓小平说，不要细抠文化和原则问题，如果有人要求返还财产，还给他们就是了，否则可能形成恶性循环。第二点是关于邓小平和反右斗争的事情，很多学者都在问，有没有证据表明那个时期邓小平做的是正确的事，因为邓自己写了很多文献来证明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处理所有的这些文献。如果我能大胆猜测一下，可能他当时的做法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想要保全自己的权力和位置，二是担心人们对政府的批评太过猛烈，希望保护政府。

今天我们谈论了这么多关于毛和邓的事。我的一个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如果一个人身上反日的态度很强硬，那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毛主义者。如果邓小平现在是中国政府一个稳定性的象征，那么毛泽东可能更多的就是“文革”的象征，他可能会鼓励我们去更大胆地梦想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

（根据现场对话和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 原载《经济观察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